

羅光—融合信仰與文化的教育家

摘要

羅光校長有多采多姿的一生，他是哲學家、外交家，曾經擔任台南主教、台北教區總主教。教育家的身份對他來說，只是各種身份之一。但在他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十三年半中，卻是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以後卓有建樹的時期。

羅光有其一貫的人生目標，其教育理念即來自於其人生目標。簡言之，在中國文化中實現基督信仰即其人生目標，而他在輔仁大學的教育理念也與此契合。故羅光提倡人格教育、愛心教育，重視學生的自由思想，在學校中倡導敬天祭祖。羅光的教育理念，迄今仍在輔仁大學實踐。

羅光—融合信仰與文化的教育家

壹、前言

貳、羅光教育理念的根源

參、輔仁大學第二任校長

肆、羅光教育理念及其實踐

伍、結語

壹、前言

羅光(1911~2004)生於湖南衡陽，一輩子帶著他的湖南鄉音說話。他字達義，號焯炤，都與其宗教信仰有關。「達義」是其聖名 Stanislaus 的音譯，「焯炤」則取基督是世界之光的意思。他在出生時，家中已有數代天主教信仰，是衡陽市南鄉陡陂町的小康之家。

在民國八十年時，羅光自憶其人生階級。他說：「我的八十年生活分成三大段：衡陽十九年，羅馬三十一年，台灣三十年。衡陽十九年，十二年在南鄉老家，七年在黃沙灣修院。羅馬的三十一年，九年求學，二十五年教書，十八年在駐教廷使館任教務顧問。¹台灣的三十年，五年在台南任主教，十二年在台北任主教，十三年在輔仁大學任校長。八十以後的歲月，全在天主之中。」²羅光八十一歲退休後，長住天母牧廬，但仍在輔大及文化任教。1996年後頗為病痛所苦，多半時候在台北榮總病房中度過，不能說話，但仍能思想，寫作短文成篇，稱為《病榻隨筆》。2004年2月28日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。

從信仰角度看，羅光是一個有清晰思想及深刻經驗的虔信者。如果按照一般世界的標準，羅光十八年使館教務顧問的工作，可稱之為是一位外交家，且在其人生中，有五十餘年實際參與並影響了中梵外交關係。他在台灣長時期擔任教區

¹ 羅光讀書至第六年晉升神父後，接任傳信大學中國文學教師，同時仍念神學，然後念法律。1943年中國與教廷通使，任教務顧問，同時仍在傳信大學授課，直至1961年被任命為台南主教。

² 羅光〈八十述往序〉《羅光全書》序，各冊前均有。

主教，所到之處皆有建樹，因此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教會領導者。自他 1936 年開始教學生涯後，六十年間著述不斷，主要以哲學著述為主，在學術界，大家公認他是一位著作等身、望重士林的哲學家。和前述各點相比，羅光教育家的身份，只是其多采多姿人生中的一個部份。

在這樣的理解中，本文擷取羅光人生中他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十三年半的時間，以他治校的理念及作為，來說明他教育家的身份。有關羅光的研究，不假外求，《羅光全書》是最完整的資料，其中有各式各樣羅光的回憶及言論。因此本文性質多半只是編輯，羅光自己才是真正的作者。

貳、羅光教育理念的淵源

羅光的一生最長時間是在從事「教」與「學」的工作。他前往羅馬傳信大學就讀，可說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，在此之前他是一位聰明而虔誠的修士，但他仍只是在傳統中國天主教結構中。在這個結構中天主教是洋教，主教是外國人。湖南衡陽是義大利方濟會士的傳教區，外籍傳教士是主角，中國籍神職都是配角，更別提一般教友。選派中國優秀修士到羅馬傳信大學念書，是第一位教廷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（Celso Costantini）的政策，一方面可以打破部份歐洲人不正確的種族優越感，證明在不同膚色下有相同的心智；另一方面也是在羅馬提供這些中國神父的候選人，足夠完善的教育，使得他們回國後，能在立足點上與外籍傳教士平等。

在傳信大學中第一位給予羅光重大影響的人是于斌。觀察羅光的一生，于斌是他重要的仿效對象。于斌是傳信大學中國學生中的傳奇人物，他身材魁梧、儀容出色、成績優秀，他 1924 年來傳信大學，1929 年就在傳信大學教中國修生各種中國學問。羅光回憶說：「我去羅馬的時候大約有三十位中國學生。于樞機在神學班是中國思想，在哲學班教中國文學；後加易經，中國修辭學，我都去聽課。後來成立傳教學院，他又教授中國思想。³」羅光了解教廷培育他們的目的，是要他們回到中國後能和外籍傳教士平起平坐，日後要成為中國教會的領袖，于斌不只是傳信大學中國修生的領袖，日後也是中國教會的領袖，因此于斌的學問、儀態、待人接物，都是羅光學習的對象。

剛恆毅是在羅馬培植中國修生的重要推手，他在 1933 年返回歐洲，1935 年即擔任教廷傳信部次長，他是影響羅光的第二個重要人物。從 1936 年羅光祝聖為神父，並在傳信大學教書開始，直至 1958 年剛恆毅逝世為止，每週數次，羅光習慣性的向剛恆毅請示或求助。「所遇到的不是一位高級主管，而是一位和藹可親的父親，又體驗到是一位有原則的長上。⁴」羅光也回憶剛恆毅的待人接物：

³ 《羅光總主教訪談記錄》，未出版，收藏於輔仁大學校史室。

⁴ 羅光〈剛恆毅抵華七十週年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七，頁 318。

「剛公和我講話很簡單，有問有答，每事必有答案，決不拖延。……該講的話就講，不轉彎，不生氣。……教廷各機構早上八點到兩點辦公，下午休息。我下午到剛公住處，他住在傳信部大廈的一戶房間，下午他常坐在躺椅上看書或寫作。……他常對我說：『越事情忙的人，越能找出時間；越沒有事情的人，越找不出時間。』」⁵」認識羅光的人就知道，他對剛恆毅的描述，也是他自己的寫照。

剛恆毅與于斌個人的表樣是形塑羅光的重要因素，但更重要的是剛恆毅及于斌代表了一種時代風氣，可稱之為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思想。這種思想從雷鳴遠（Vincent Lebbe）發其端，中國天主教徒英斂之、馬相伯贊助、響應。雷鳴遠首先提及，愛國是中國天主教徒的權利，反對歐洲傳教士長期控制中國天主教教會，主張建立中國神職擔任主教的天主教教會。英斂之及馬相伯贊成雷鳴遠愛國主張，再提倡天主教教育，認為要提昇教友及本地神職人員素質，特別是國學程度。他們兩人在 1912 年聯名向教宗上書，請求教廷在華北地區設立大學，此即為日後北平輔仁大學之濫觴。他們認為當時的傳教方式錯誤，因為傳教士未融入本地文化。反之他們以為利瑪竇、湯若望及南懷仁等，適應中國文化的方式是正確的，因為基督信仰是不反對任何文化的。當時剛恆毅來華就是在此種氣氛中，教廷給他的任務是祝聖中國主教，設立天主教大學，去除歐洲國家對在華傳教不當的干預。在這種思想中，剛恆毅要求各教區選派優秀修生到羅馬念書，于斌正是其中的佼佼者，于斌在 1933 年回國後，持續推動相關工作，在 1936 年並被教宗派任為南京主教。羅光則是于斌之後的佼佼者，在羅馬薰陶培養的過程中，他的各種意識就被逐漸的建構成形。

剛恆毅的思想在此種學習過程中，也就成了羅光的思想。羅光評價剛恆毅有三個重要原則：第一，專心宣傳福音事業。第二，專門研究天主教藝術。第三，愛護中國文化。⁶這三點亦為羅光所珍視者。作為一位國籍神職人員，羅光和于斌等人一樣，都是主張自己愛國權利的。從其對中國文化的認識，他努力要使信仰與文化結合。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融合，可謂是輔仁大學的思想核心，也是于斌、羅光等人教育理念的核心。

羅光尊為師者還有陸徵祥、吳經熊等人。陸徵祥為中國外交界名人，曾任外交總長、國務總理等職。在比利時籍夫人去世後，進入比利時本篤會修院隱修。羅光曾數次前往拜訪，並做訪談。陸徵祥修道的動機之一是尋求孔子與基督相合之道，所以羅光不只從陸徵祥處習得外交內涵，也在這種文化相遇的企圖中得到啟發。吳經熊是第二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，往駐教廷，目的主要是翻譯聖經。羅光上午在使館辦公，下午則協助吳經熊翻譯校閱聖經新約部份。羅光不只協助公務，家中雜務亦多予幫忙，但羅光回憶說：「我們兩人談話時，談家中雜務很少，談館務也不多；他把這一些事務都信託我。我們談話所談的，除譯經外，便是精神修養。」

⁵ 羅光〈亦師亦友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六，頁 438-439。

⁶ 〈懷念剛恆毅樞機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六，頁 231-232。

由上所述，似乎羅光所長都是自外倣效而來，確然如此，但其實不盡然如此。每位大家各有所長，但亦有所不足，羅光善於吸收眾人之所長，避其所短；集眾人之長而融洽之，則成羅光個人之學。由此而深入發明之，猶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有關融匯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，羅光晚年曾比較自己與其他學者，他說：

「我不否認是老年人，但是絕不承認是守舊，更不承認是守舊的老迂闊。青年人大約不知道我是十九歲到羅馬留學，五十歲才來到台灣，在羅馬住了三十一年，生活完全西化，……所以不是土包子。我是要上攀胡適、俞大維、方東美、吳經熊一輩學者，學好了西洋的學術，再通中國的學術傳統，說適合中國民族性的話。胡適講考據而重儒行，俞大維講中庸而拜觀音，方東美講生生之道，吳經熊講靈修而重禪道，都實行融匯中西。真正一位中國學者，必定應能達到這種境界。」⁷

這些人都是羅光心目中的標竿，羅光知其長，取其合於己者，所要做的和這些大學者一樣，融匯中西。

參、輔仁大學第二任校長

輔仁大學在台復校的第一任校長是于斌，他在大陸時期即擔任輔仁大學董事，參與了中國天主教教會絕大多數的重要事務。他嘗試於融合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，他也了解輔仁創建的背景，因此在復校之初，他就訂出「真善美聖」作為在台復校輔仁的校訓。「真」是真理，以理智獲取，而大學主要就是求知之所。「善」是道德，教育過程中應培養人的倫理觀念。「美」是情感合理的、適度的表達。人生在世，基本上就在理智、道德、情感的三維向度中發展，而「聖」所描述的就是超越人世的、信仰的追求。于斌接著將此四個向度用人與人、人與自然、人與神的三個關係，所謂的「三知論」加以解釋。而融會基督信仰與中華文化，于斌總結說就是「敬天愛人」四字，此四字無論為儒家思想或基督信仰都能圓融無礙。因此輔仁大學融會中西的理論基礎，已經由于斌加以奠定。羅光扮演的角色是追隨者，但重要的是以此為基礎，加以深化、發揚、整合、創新。

羅光固然是謹慎的扮演追隨者的角色，但他日漸展露的鋒芒，愈益增進的學術及行政能力，卻使人不得不注意及他，很自然的將其視為于斌輔仁大學校長職務的接班人。在輔仁內部運作不順時，甚至外界有些流言蜚語，認為羅光有意藉著這個機會，成為輔仁大學的校長。為此羅光澄清說：「我從來沒有自動和輔仁大學拉上關係，別人卻拉者我走，造成外間對我造成許多傳說。」⁸第一次發生這樣的想法在 1970 年，當時因為于斌任林棟擔任夜間部主任，及教育部要求輔仁大學改變組織架構事，且于斌當時已七十歲，教會內遂有人運作要求于斌辭

⁷ 羅光〈談青年輔導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六，頁 429。

⁸ 羅光《生活自述》頁 63，（台北：輔仁大學出版社，1997 年 6 月出版）

職。中華教會內有學術聲望者，一為香港主教徐誠斌，另一為羅光；徐誠斌不可能放棄香港教區，羅光遂為于斌辭職後的受益者。⁹羅光說的很準確，在此事中，他沒有主動參與，他是被參與輔仁大學管理的耶穌會和聖言會拉著走。教廷要求于斌辭職，引起中華民國教育部反彈，差點釀成外交事件，最後輔大董事會請于斌續任，於是才化解難題。第二次在 1977 年，因于斌年事更高，教廷乃請其退休，並指定羅光接任。羅光在交接典禮上這樣說：「我來接任輔大校長，不是我自動來的，更不是我要求或謀求來的。去年傳信部長羅西樞機和陶代辦問我願不願意接任輔仁大學校長，我答說不願意；不過，若聖座有意思叫我去，我會接受。」從 1978 年 8 月，到 1992 年 2 月卸任，羅光在輔仁大學十三年半任校長。

羅光自己對他所接任的輔仁大學有很清楚的描述：

「輔仁大學的組織是聯邦制，由中國主教團（中國神職人員）、聖言會、耶穌會三個單位組成。……這種制度在天主教會尚稱創舉，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，備受主教們的喝彩。……當時三單位的每一單位有自己的教務處、訓導處、總務處。學校的全校教務、訓導、總務，只有名而無實。後來因教育部的干涉，全校的教務、訓導、總務三處，實際向教育部負責，三處的辦公處則分別設在三單位的校舍內。……學生要接洽各種事情，須往三單位教室跑。校長為和職員談話，職員須從三處的教室，在夏天炎日和冬天寒風下走來走去。董事會開會時，校長室也曾兩三次提議建築公共辦公樓，三單位的董事都以為要花三單位的錢，便答說不必要。我接任校長以後，體驗到沒有公共行政大樓的不合理，乃先籌款，不動用三單位的錢，後來尋覓建地，決定興建行政大樓。民國六十八年（一九七九年）我就任校長的次年，十一月五日，贈送名譽博士學位與西德赫夫奈樞機，並請為行政大樓（定名野聲樓）主持破土典禮。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日，驗收行政大樓野聲樓，集合校長室，教務、訓導、總務三處，夜間部，在同一大樓分層辦公。」

「我到輔仁大學任校長時，校長室只有秘書長一人，副秘書長一人，經管校長室和人事室業務。秘書長龔士榮神父已辭職，我邀主教團秘書長李震神父接任秘書長，李神父堅請劃清職責，秘書長只管學校三單位聯繫事務和諮詢委員會事務，位似普通副校長的位置。原先龔神父所管校長室和學校建築，學校公共經費等等事務，都不再管理。我乃首先成立人事室，再設立公共關係室，學校秘書長室，校長秘書室，校友聯繫室，最後設學校基金室。」¹⁰

由上所述可以看出，羅光任校長的時期，輔仁大學進入組織化的階段，權責有了更明確的劃分，基本上這是羅光的風格，也是其意志的展現。此後為了學生

⁹ 有關此段過程，在拙作〈龔士榮神父所參與的輔仁大學—輔大易長事件〉有最詳細的說明《學風與傳統學術研討會》（台北輔仁大學 2005 年 12 月 7 日舉行）。

¹⁰ 羅光《生活自述》，頁 75~76。

社團活動的需要，在 1985 年建成學生社團專用大樓焯焯館，1988 年利用聖言會校旁購置的土地，建成綜合體育場。

在羅光擔任校長時期，輔大設立了藝術學院和醫學院。羅光對藝術學院的看法，基本上來自剛恆毅。他說：「輔仁大學為天主教大學，為國家培植人才，也為教會培植專才。在北平創辦以後，對中國天主教的繪畫藝術，曾經培植了一些天主教繪畫專家，以陳路加為首。在台北復校，輔仁大學注重哲學又關心神學，為教會學術在中華民國的思想界得有一席之地。為教會藝術，乃設立藝術學院。」¹¹1985 年羅光為藝術學院破土。

醫學院的設置本來不在羅光的計劃之內，因為「醫學院的制度，可以超過一處小型的大學，經費的多，敵匹一座普通大學。…我沒有想設立醫學院，也不敢想籌設醫學院的校址和校舍。」後來因姚宗鑑副主教的籌劃，「我便著實考慮實際辦法，邀請教育部部長和衛生署主任座談，結論為輔大可以設立醫學院，但在近三年以內，不設立醫學系，僅辦護理系、公共衛生系、心理輔導系。經過了這一難關，先在主教團取得同意為設立的單位，後以不運用三單位經濟的條件，勝過聖言會的阻力，贏得董事會的批准。……」1990 年的醫學院成立，1992 年 12 月醫學院建築落成，其時羅光已卸任校長。

宗教系所的設立亦為羅光校長任內的大事。教育體系自民初以來即將宗教與科學對立，將宗教自教育內涵中抽出。影響所及，教會可興辦大學，但必須完全按照教育部的課程。輔大創辦之後即無法設立神學院，亦不准設立宗教課程。羅光上任後利用公私機會，和教育主管單位溝通，甚至為此舉行學術研討會，探討宗教教育的合理性及功用，終於在 1988 年得教育部准許設立宗教研究所，1992 年羅光退休後宗教系設立。

除了學院系所之外，羅光亦以其所設立之學術行政機構及傳播媒體自豪。1980 年他設立了「益世雜誌」，由輔大出版社負責發行。益世雜誌名稱來自《益世報》，是雷鳴遠神父在天津創辦的報紙，抗戰期間停刊；于斌在昆明、重慶續辦。遷來台灣後，「台灣天主教會和民間學人，常有恢復益世日報的呼聲，于斌樞機和我都不斷接到這種請求；可是人力和財力，都不能實現所請。」益世雜誌的設立「是想豎立一個中正的目標，以正確的思想來面對社會各種問題，不自誇大，實事求是，『正人心，息邪說，拒陂行』」¹²不過辦一份雜誌仍需足夠稿源，編排亦頗費人力，因此在 1987 年停刊。1989 年又發行羅光《益世評論》雙週刊，刊登短篇論文，對時事表達意見。「在不作人身攻擊，不反對天主教的大原則下，自由撰寫。」¹³

羅光向來注意蒐集天主教文物及史料。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，為能更了解

¹¹ 同前，頁 88，剛恆毅對北平輔仁美術專科的走向有頗多指導。

¹² 羅光〈益世雜誌發刊辭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二，頁 238。

¹³ 羅光《生活自述》，頁 84。

鐵幕中天主教會的概況，羅光組織了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小組，後以此為基礎，成立「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」。在文物方面，羅光除蒐集各式祭披、聖經中文譯本，要理問答、聖像畫、歷史照片等，又蒐集有田耕莘樞機遺物，輔大原本即在龔士榮神父努力下，蒐集于斌校長各式物品，以這些文物為核心，1987年成立「中國天主教文物館」及「校史室」。羅光說：

「參觀學校的人，參觀學校的中心—行政大樓，拜會了校長和行政主管，知道今天的輔仁。登樓參觀校史館，得知輔大的來歷，乃有輔大全貌的觀念；在參觀中國天主教文物館，更明瞭輔仁大學的地位和使命。至於大陸教會的史料，則設有中國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，史料館為收藏，不為陳列。」

14

為協助學術交流的行政工作，羅光在1988年設「學術交流室」。成立於1989年的「中西文化研究中心」，為資助研究工作的機構，這兩個機構是日後研發處的前身。

1990年7月教廷駐華大使館的裴納德（Adriano Bernardini）代辦來輔大，向羅光示意當年準備繼任人選。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準備，1991年10月，裴納德又來輔大見羅光。羅光說：

「裴代辦繼續來出示教廷教育部通知輔大校長任命事，歸他們管理，不屬傳信部。且怕我不辭職，竟先任命狄剛總主教為總監督，我很不高興，乃向董事會辭職，又向教廷教育部辭職，並表明辭職即日生效。裴代辦乃來信緩頰，說明教廷教育部授我以榮退校長銜，……學校三單位議定聘我為終身講座教授，我乃聲明不領退休金，決定於2月2日舉行交接禮。」¹⁵

其時羅光已八十一歲。

羅光在1991年間自己寫了一篇寓言文章，說夢到自己到一座王爺廟參拜，王爺和他說話：「老頭兒，你竟不認識自己的老師？我曾教你把自己供做偶像，自己拜自己，教別人也拜你。」羅光答說：「大學校長我已經要退休了，外面開會我不去，應酬酒會我不參加，天主教慶典我常缺席，我什麼時候聽你教我做偶像崇拜。」王爺把羅光趕出廟，羅光出殿時撞到一個女香客，女子尖叫：「老頭兒，規矩一點。」然後又撞著一個老者，老者說：「年歲大的人，慢點走，看清路才走。」¹⁶這篇寓言透露出羅光將退休前的心境，也表現出別人對他的誤解及提醒。可以論斷的是，教會主事者中，行政能力及學術能力，羅光的確是首屈一指的，雖已過八十高齡，羅光退休時還是有些惆悵。

¹⁴ 同前，頁80~81。

¹⁵ 同前，頁223~225

¹⁶ 羅光〈如夢初醒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七，頁207~208。

肆、羅光的教育理念及其實踐

1978年7月18日，當時羅光已確定將接任輔仁大學校長，他在一場天主教中小學主任講習會裏講〈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應有的特色〉，可以代表他所思考包括輔仁大學在內的天主教學校的教育理念。關於天主教學校的教育目標，羅光先引述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「教會教育宣言」：

「真正的教育的目的，乃為培植人格，以追求人生的最後目的，同時，並追求社會的公益，因為人為社會之一員，及其成長也應分盡社會的職責。」（第七節）

「在一切教育工具中，學校有其獨特的重要性，因為學校的使命為悉心培養學生的智能，發展正確的判斷能力，傳授上代所得的文化遺產，激勵價值意識，準備職業生活，在不同性格，不同環境的學生中促進友善相處，培養互信互諒的氣氛。」（第二十節）

「所謂天主教教育，不僅如上所述之培養完善的人格，其主要者乃為使領受聖洗的教育青年，逐漸認識救世的奧蹟……能按照具有真實的正義與聖德之新人的方式度私人生活。」（第九節）

羅光引述的三段文字，第一段是說明教育的目的；第二段說明學校教育的目的；第三段則是說明天主教教育的目的。

「就教育的普遍目的而言，主要是培育青年人的人格。人格的基礎是天生的。……每個人要在這種天生的基礎上，建造自己的人格。……學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於教導學生琢磨自己的天生質料，以建造高尚的人格。

為培育人格，應先給青年們一個崇高的模範。孔子為教門生培育人格，指示學生以『君子』作模範。我們天主教的人格模範乃是『基督』。……

天主教學校教育的目的，便在於培育青年人知道自立、自主，知道自立自主的範圍，習慣在適當的範圍內去活動。」

以人格教育為基礎，羅光認為教育的進一步目的是使學生了解生活的意義，也可說是人生的目的：

「人生的目的，當然是宗教的信仰；然而，不談宗教信仰也可以講人生目的。孔子、孟子常以自己負有建設倫理，以立己立人的天命。知道自己負有一種使命，就是生活目的。

人生的目的，乃是一盞明燈。可以照見各種學識和各種技術的意義。人生的目的又是一根繩索，能把學術和生活聯繫起來。給人一個生活的意義。」

在羅光看來，強調德、智、體、群四育的教育內涵固然是好的，但天主教學校的教育，是以人生的最高目的，統轄四育。而所謂人生的最高目的，就是為基

督作見證。羅光解釋說：

「此並非把學校變為宣傳宗教的機構，更不是把學校變成一座教堂。」

「天主教學校對於天主教學生，應該培育信仰的知識和實踐施以宗教教育，使學生『逐漸認識救世的奧蹟，能日益領悟信德的恩寵，能以心神以真理崇拜天父。』

對於非天主教的學生，應給他們良好的機會可以『認識救世的奧蹟』，而且更要在不信基督的社會裡，以事實作福音的見證。」

在此目標下，羅光認為天主教學校有如下之特色。

一、開放性

在學校的招收方面，天主教學校是開放的；在教師的聘請方面也是開放的，在思想方面更是開放的；接收當代的思想，保存民族的傳統，對於學生的錄取不分宗教信仰，絕不強迫學生參加天主教儀典。祇是在學生的心理上，給予走向福音的啟示。

二、富有福音精神的仁愛與自由

天主教學校素來以實行愛的教育為特色。校長和老師對學生常以愛為原則，尤其對於有問題的學生，常以愛去輔導。雖然懲罰在青年的教育上，有其重要性，然而，要使學生在受懲罰時，知道懲罰是出自愛心。

福音的自由，是人格的自由，是天主義子的自由，在學校的校規和教育的法令內，應容許學生有相當的自由，以培植學生之自動自發精神，這種自由應當是健全人格的表現。目前我們的教育因著考試的壓力，學生常是被動地接受教育，缺乏思考的習慣，缺乏正確的判斷力。我們天主教學校要在精神方面鼓勵學生自動自發。

三、教師的身教

「我們要求教會的學校時培育人格的學校，我們必須要求學校的教師，人格高尚，品行端重，在目前師道衰頹的時代，我們的學校要尊師重道。為提倡這種風氣，最重要的一點，是老師們能自重。行為輕浮，不求仁義祇求利，思想不純潔的人都不可以在我們的學校任教。」

四、尊重民族傳統文化

「天主教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宗教，所有信仰的思想及儀式，雖然因原在歐洲養成而又由歐洲向外傳播，帶有歐洲文化的型態，然而，天主教在每一個民族裡，是該民族的宗教，在思想和儀式上應該接受該民族的傳統文化。中國的天主教是中國人的天主教，在中國人主管的教會，中國信友裡有了哲學專家時，便要使神學和教儀中國化。因此，天主教學

校應特別看重中國的傳統文化，教育學生實行固有的善良倫理，實踐三民主義，培養民族意識，愛護國家和民族。」¹⁷

從 1988 年的另一篇名為「輔仁大學的教育理想和現況」的文章中，大致可以看出羅光教育思想是在同樣的氛圍中發展。他說：

「輔仁大學名為天主教大學，實際上在一萬五千多位的學生中，只有五百位天主教教友；在一千一百位教師中，只有一百五十位天主教教師。……在這樣的具體環境裏，為表現天主教教學的理想，輔仁大學乃有幾項教育原則。

一、學校是開放的：……

二、人格教育：……

三、愛心教育：……

四、自主教育：……

五、宗教輔導：天主教學生組織同學會，有要理班、歌詠團、聖經班、禮儀輔導。同學又組織醒新社和同舟社，邀教友同學參加，兩社各五百多位社員，從事校外的社區工作，協助盲人院和痲瘋病院的病人。

六、學術研究：一方面重視思想教育，編印天主教思想書，供全校師生參考。一方面發展其他學校沒有的學系和研究所。以輔大私立學校的人力和財力，不能和國立學校在所有課目上競爭，但是選定我們學校所長而別校所短的學科，盡力發揮。」¹⁸

在這篇文字的前面四項與其 1978 年所設想的並無二致，並在各種不同的機會經常闡發。後兩項則是新的教育環境下的思想，有關於宗教部份，經過反覆的溝通，教育主管機構對宗教的敏感心態減少，宗教也被接受為學術的一部，因此可以推動在學校中與宗教有關的活動。至於學術研究，則是因大學增加，彼此間的競爭也增加；私立學校在經費上無法和公立大學競爭，必須建立自己的特色。這兩項可用宗教教育及私立學校兩者來說明。

在前述羅光的教育理念中，宗教教育與人生的最高目標其實是同樣的事情，宗教信仰的精神貫穿教育，在羅光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，只是教育主管單位不理解。所以在宗教教育上，羅光的主要訴求是宗教教育的合理性。他曾從歷史出發加以考察：

「在民國成立以前，教會學校有宗教教育，民國初年教育部不承認宗教教育，國民政府的教育法令禁止在私立學校以宗教為正式課程，並且不容許學生參加宗教儀禮。

¹⁷ 羅光〈天主教學校的目標和應有的特色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四，頁 89~99。

¹⁸ 羅光〈輔仁大學的教育理想和現況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四，頁 39~40。

為什麼有這種事實呢？中國知識份子，認為天主教與基督教為侵略中國及中國文化的歐美帝國主義，再者，他們認為宗教是迷信，和現代的科學相矛盾。

但是，現在我們若問政府官員和社會知識分子，大家都不說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帝國主義，也不願說是迷信，然而卻又覺得宗教和教育不相關，不必在教育內有宗教教育，這是因為中國歷代對於宗教的觀念，祇知道人和神靈的關係，這種關係僅祇是求福免禍的關係。天主教和基督教則肯定宗教信仰為人生的基礎，包括人生的各部份，人生的目標和一生價值觀，都以宗教信仰而定，教育既為培養人格，便應該有宗教教育。」

他反對教育主管當局，長期不承認神學學位的做法。他指出神學院做為人文學科之首，不僅在中古時期，現在歐美許多大學仍然如此，即使在不信基督宗教的日本、韓國、印尼也都承認神學院的學位。¹⁹

宗教教育問題在結構上，來自於教育主管當局對私立學校的管控與限制，這是羅光在從事教育工作後的經驗。1989年至90年間，立法院通過新的大學法及私立學校法。羅光認為：「新的私立學校法，第一不要冠以私立，第二不要偏於防患的消極精神。」羅光認為不要用「私立」，而要用民立，他也對教育部的「輔導」非常的反感，他說：

「所謂輔導，常把民間創立的學校，看成小孩，看成歹徒，嚴加看管，派來從沒有辦過大學的督學，按照法規條文，指專任教授人數不夠數目，他也不想民立學校的經濟不能和國立的學校相比；指出教外文的教授，外籍人數過多，他也不想教美文以美國教授，教西班牙文以西班牙教授，可以教得更好。

補助經費，一個富裕的政府應該樂於去做，使國民所受教育常是優良的教育。但為補助應規定明瞭的原則，不要由教育部隨意去獎勵，或者學校千方設法去追求。

……民立學校不是營利機構，是替國家辦教育事業，教職員的工作薪金，學校要付，他們的保險金和退休金，應該由政府負責。」²⁰

基本上羅光認為政府獨攬教育權是有問題的。教育權是一種天生人權，屬於父母所有。他說：「無論在什麼制度之下，子女是屬於父母的，家庭為先天的組織，在法理上，在歷史上，先於國家；國家雖也是先天的組織，乃為補家庭之不足。」因此父母有為子女選擇學校的權利，私立小學及中學生抽籤的規定，就是對此人權的剝奪。不開放私立中學的設立同樣是剝奪人權。²¹他認為政府應多支持私立學校，支持的辦法他不贊成用獎助的辦法，因為獎助金既少，分配的標準

¹⁹ 羅光〈宗教教育〉同前，頁322。

²⁰ 羅光〈新年談新大學法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七，頁112~113。

²¹ 羅光〈開放教育權導正教育風氣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四，頁145~147。

又很難達成，結果常不發生效果。「就是生效，也造成好的學校繼續好，壞的學校繼續壞。」支持私校的辦法，首先是容許各系所按需要提高學雜費。其次是政府應訂定固定支持私校經費佔全年教育經費的百分本，「按照各私立學校的學生人數和教師人數和研究工作之所需，每年核發各校支助費，使學校安心訂立發展目標和計劃。」²²羅光的想法到今天為止，仍在私立學校和教育主管機關的拔河中擺盪。

羅光在就任輔大校長後所推動的「敬天祭祖」，頗能代表他的教育理念。敬天祭祖首先由于斌自 1970 年後提倡，但在輔仁大學內舉辦，則自羅光時期開始，他說：

「輔仁大學為教會學校，在教育方面須特別注意人格教育，在生活方面應培植學生有正確的觀念，……因此學校乃有禮儀週、教孝月，便也要舉行祭祖典禮，教學生愛家庭、重孝道。

彌撒為天主教唯一重大禮儀，社會也都知道天主教行彌撒，我們也就應該讓學生們見識見識。……可是教育法令禁止在學校有公開宗教典禮，我乃想在學校舉行祭祖，教育部不能反對，祭祖前有彌撒，教育部也不能挑剔。」

「這項典禮，從我到校長任所後開始，已經舉行了十多年，學校同事中在開始時有許多人不同意，不贊成舉行彌撒，說是參禮多係教外學生，不懂彌撒意義，不守禮儀規則。但因我堅持，大家漸漸進入狀況，在我退休前兩年，大家都感到禮儀對學生很有意義。」

由於培養學生自主及愛心教育的理念，羅光相當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權利。1980 年代後期，各校學生運動盛行，輔仁大學現任校長黎建球有如下的回憶：

「一九八八年臺灣正值總統選舉，各界對改革之期望至深，乃集合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向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李登輝先生請願，頗有不達目的絕不中止的味道，大學生在這些請願活動中扮演了極為積極的角色，頗令各大學校長憂心。輔大學生當然也不例外，羅總主教乃在三月中去探望他們，羅總主教一方面和他們在一起，一方面也同時要求他們儘快返回校園，當時，輔大學生也很爽快的向校長報告：見到了總統，訴說了心願之後，就會返回校園。而學生們也真的如同所答應校長的就再三月二十一日返回了校園。第二年，一九八九年五月大陸天安門事件發生，臺灣的學生為聲援大陸的學運，群聚在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，學運期間羅總主教也曾經兩次親自去看學生，和他們坐在一起，支持他們，鼓勵他們，並聆聽他們的心聲，但也要求他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和 safety。他在任校長期間時時以學生為念，也對學生很有影響力。」²³

²² 羅光〈善用教育經費建立學術教育基礎〉《羅光全書》冊卅四，頁 142~143。

²³ 黎建球〈羅光總主教留在輔大的風範〉《羅光主教思行傳畧》，頁 3。

1990年3月是台灣學運的最高潮，各校學生聯合在中正紀念堂靜坐，羅光也在3月20日前往探視，他似乎是一個沒有缺席學運的老人。在各種學生活動中，黎校長也認為羅光常是站在學生一邊的，他說：

「常有人說羅總主教的脾氣不好，很像一隻湖南騾子，而事實上他常常是對那些社會上、國家政策及法令上的不公平、不正義的事情上發火，特別是擔心學生權益受損時，他就會十分著急、生氣。筆者在任訓導長期間就曾有一次為了學生要求的活動，訓導處不同意，總主教站在學生一方，討論中，我們也不願讓步，就在言語中槓了起來，他在情急之下，拍著桌子堅持，我震懾於他的威嚴，也感動於他為學生爭取空間的愛心。」²⁴

在羅光任校長之後，輔仁大學的導師制度漸有規模，羅光要學校的導師們放下身段，採取溝通的態度。他也說明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：

- 一、任何的活動，溝通的模式是：可以，但是……，告訴學生該如何做？讓大家都可得到益處。
- 二、學生參與本校各級會議，凡是參加者皆可投票，無論是行政會議或是校務會議。
- 三、要有限制。不能妨礙同學求學的環境、不能作人身攻擊、不違背政策（因那是政治問題）、校外行為自己負責。

在那個學運狂飆的年代，羅光按照他的教育理念行事，舉重若輕的平安度過。

伍、結語

在眾多羅光的回憶性文章中，什麼最能代表羅光的教育家心懷？他的退休致詞是一篇經典，有系統的說明十三年半校長生涯中，羅光對輔仁大學在軟硬體上的貢獻。不過內容前文已大略述及，此處則想用另兩段文字加以說明。第一篇是《獻身五十年》，這是為紀念晉升神父五十年而做。在這篇長文中羅光引用孔子的話：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而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《論語·述而篇》又說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。」羅光說：「我作一位大學校長，不是應該有這樣的人格嗎？」²⁵

接下來羅光引用吳經熊所翻譯的聖保祿書信，這是當年他和吳經熊在羅馬字斟句酌的結晶。

「聖保祿宗徒說：『吾欣然以柔弱為樂，庶幾基督之神德，能常寓吾身。吾為基督之故，凡肉體之柔弱，及一切侮辱、艱難、窘迫、困苦，皆所甘受。』

²⁴ 同前，頁4。

²⁵ 羅光〈獻身五十年〉《生活自述》，頁253~254，寫此篇時羅光任輔大校長第八年。

蓋吾之弱，正吾之所強也。』(吳經熊譯，致格林多後書，第十二章第九、第十節)主教乃宗徒的繼承人，聖保祿宗徒的生活規則，就是主教獻身的規則。我已七十五歲了，不認老也得認老，老則多病，老則精力疲弱，工作低微，心理上使奉聖保祿的生活規則為座右銘了。但是每天走在輔仁大學的校園裏，處處遇到輕鬆快速的腳步，眉開眼笑的青年面貌，我却又『不到老之將至云爾』。帶領他們走上人生正當的路途，可以『誨人不倦』。²⁶

在這篇文章中，羅光信手拈來，用了孔子和聖保祿的金句，描寫他擔任輔大校長的心態，這正是一位融合基督信仰與儒家文化教育家的自然寫照。他回憶起的吳經熊是他敬佩的學者和長官，翻譯的新約聖經是文言文，由此延伸到兩千年的聖保祿，和兩千多年前的孔子，也都成了羅光學習的對象。學而後教之，也正是羅光教育家身份的實踐之道。

第二篇是一首不全合體例的古詩，在他自輔大退休兩年多後發表，由詩句中可以看出，即使羅光不完全承認，其實他最愛的身分是學者，他最懷念的角色是輔仁大學校長。謹以此文作全篇的結尾：

斜陽雨後樹多霧，課畢學子塞校路。
講壇高論風消散，年輕情懷笑語訴。
行政樓坐十四年，鬚髮銀白氣喘吁。
種樹成蔭忙樹人，長望上天賜雨露。
而今退休策杖行，校園綠葉隨腳步。²⁷

²⁶ 同前，頁 254。

²⁷ 羅光〈讀書—教書〉《羅光全集》冊卅七，頁 474~475。